

政治传播视域下“视频化政治”的生成逻辑与表征路径

赵泽鹏 万立良

摘要：媒介化现象深入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内容承载的视频技术也开始在全球政治传播中崭露头角。文章基于视频媒介在政治信息全球传播中的崛起现状，结合政治媒介化理论对“视频化政治”的内涵及逻辑进行了概念厘定，并引证全球政治传播实践案例探析“视频化政治”的表征和内容构成。研究发现：视频化现象已经深入政治传播领域并形成“视频化政治”，这重构了政治传播的传播方式、参与方式、传播内容和准入门槛。在全球政治传播实践中，各方行动者以视频媒介为核心，立足身体政治、话语政治、情感政治和空间政治四个方面结成互动网络。现实例证同样显示“视频化政治”已被运用于放大政治信息、影响公众舆论的现实情境。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重视“视频化政治”的现实价值，发挥其塑造国际形象、促进跨文化传播、把控国际舆论的国际传播效力，或将为中国国际传播开拓发展空间，营造良性有序的国际舆论环境。

关键词：视频化政治 社交媒体 政治媒介化 政治传播 全球传播

一、引言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已经深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认知模式和社会互动方式。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空前提升，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促成了对于社会世界的共同理解，从大众媒体到数字媒体，在媒介技术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环境。^①

[作者简介] 赵泽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传播；
万立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传播。
北京 100089

[收稿日期] 2024-1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编号：21&ZD314）；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元宇宙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路径与战略研究”（编号：SC24DCM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油管平台涉华舆论中短视频意见领袖的角色与效能研究”（编号：2024JX038）

^① Nick Couldry and Andrea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18.

不仅个人的娱乐、社交等日常生活呈现媒介化发展趋向，教育、商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也被媒介化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正在被重塑，人们对媒介信息和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媒介化现象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①同时，媒介化也深刻影响了政治传播领域的运作方式和权力结构，“政治媒介化”势头显现，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的逻辑，媒介技术和媒介平台连接并影响着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传播。传播媒介的革新更新了政治传播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政治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政治家、政党和政府机构通过媒介平台直接与公众互动，传播政策信息、塑造公众舆论，政治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也不只是局限于传统媒体，普通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讨论和行动，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力量。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成为特朗普、哈里斯政治竞争的核心战场。特朗普以保守派平台 Truth Social 和马斯克支持的 X 平台为主阵地，通过极化的内容、平台联盟及危机叙事，利用反对 TikTok 禁令的立场拉拢 Z 世代，成功激活保守派基本盘并争取摇摆选民；而哈里斯受限于内部矛盾与 TikTok 禁令政策冲突，未能有效整合民主党支持者。最终，社交媒体平台的“直接煽动”成为特朗普在大选中压倒哈里斯奠定胜局的关键因素。

而随着视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视频以其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能够更有效地传达政治信息，逐渐成为政治表达的重要形式，视频平台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促成视频媒介成为政治传播的新宠。尤其在短视频平台快速扩张之下，各国政府部门纷纷入驻短视频平台，对公众直接进行政治宣传、塑造政治形象。政治传播能力与媒体传播能力相挂钩，不同主体顺应视频媒介逻辑进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视频媒介也在规范与形塑传播者的政治活动，视频平台成为公众政治参与、表达意见的重要载体，“视频化政治”现象逐渐兴起并在现代政治传播中崭露头角。

二、研究综述

（一）媒介化渗入现代社会

“媒介化”（mediatization）这一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Ernst Manheim）于1933年提出的“人类关系的媒介化”^②，用以描述媒介对社会和文化的深远影响。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的逻辑来传播信息、表达观念与引导公众，媒介作为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的主要渠道，对人们的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早期研究中，媒介化主要被视为一种线性的媒介效果，指涉媒介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然而，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复杂化使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媒介化是一个多维度的信息弥散过程，媒介化不仅影响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实践和社会互动模式。^③换言之，媒介、技术与社会紧密相接、无法剥离，对于媒介化的研究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性视角进行综合审视。^④

基于媒介环境的客观变迁与学理视角的转换，媒介化研究学者逐渐形成共识：媒介化已脱离媒介的工具属性藩篱，成为与社会发展并进的动态存在。媒介化学说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奇·克罗兹（Friedrich Krotz）将媒介化归纳为一种“元过程”（meta process），类似全球化、个人化作为驱动因素作用于社会，深刻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变迁。^⑤温福莱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则将媒介化概

① Sonia Livingstone,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ICA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9, No. 1, 2009.

② Nick Couldry and Andreas Hepp,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23, No. 3, 2013.

③ Andreas Hepp,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 22–23.

④ 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台湾）2014年第121期。

⑤ Friedrich Krotz,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3, No. 3, 2007.

括为延伸 (extension)、替代 (substitution)、融合 (amalgamation) 和接纳 (accommodation) 的过程,^①“延伸即媒介技术对人类沟通界限的突破,替代则为媒介取代社会行动或社会机构并改变其原貌和特质,融合则是媒介行动和非媒介行动的界限的模糊,接纳代表着人们调适接受媒介带来的改变”^②。丹麦学者斯蒂格·赫瓦尔德 (Stig Hjarvard) 提出,媒介化过程是社会文化和制度逐渐适应和依赖媒介逻辑的过程,媒介化不仅影响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还改变了社会机构和文化实践的运作方式,^③“媒介化隐含社会与文化行动者的核心成分(例如,工作、休闲或游戏等),逐渐披上媒介的形式”^④。

(二) 媒介化对政治逻辑的重构

弗兰克·埃瑟尔 (Frank Esser) 和杰斯佩·斯特隆巴克 (Jesper Strömbäck) 在《政治媒介化》一书中将“政治媒介化”划定为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逐渐依赖于媒介的逻辑和平台,他们认为政治领域在媒介化的作用下已经发生重构,政治媒介化可分为四个维度:一是媒体构成政治信息的来源和传播渠道的程度;二是媒体独立于其他社会和政治机构自主从事信息生产的程度;三是媒体信息内容受媒体逻辑或政治逻辑影响的程度;四是政治机构、政治组织、政治行动者受媒体逻辑或政治逻辑影响的程度。这揭示了政治媒介化过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⑤ 政治逻辑 (political logic) 和媒介逻辑 (media logic) 是包含在政治媒介化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政治逻辑就是政体 (polity)、政策 (policy) 和政治 (politics) 三个层次的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则,政体指政治过程的制度框架;政策是政治的“生产性”逻辑;政治为权力与公共形象获取的“自我呈现”逻辑。^⑥ 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 (David Altheide) 和罗伯特·斯诺 (Robert Snow) 首次提出,媒介逻辑就是媒介在信息传播中所遵循的特定规则和规范,媒介逻辑在塑造社会现实中有着重要作用,政治行为逐渐适应和遵循媒介的运作规则,^⑦如新闻媒体的逻辑在深度媒介化过程中影响了政治行为和舆论的形成,在新闻媒体的逻辑下新闻报道倾向于新奇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三方面,^⑧从而影响公众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和态度。立足政治媒介化的两阶概念,学者就媒介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进行了论证。马佐莱尼 (Mazzoleni) 和温福莱德·舒尔茨在 1999 年探讨了政治的媒介化过程是否会导致政治内容的浅薄化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进而对民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发现媒介化对政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产生媒体主宰政治而形成“媒体上的政治”的局面。^⑨ 尼诺·兰德勒 (Nino Landerer) 认为,尽管媒介化过程存在挑战民主的潜在风险,但它也为政治和媒体系统提供了并行逻辑,为个人民主参与和表达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信息获取。^⑩

(三) 视频媒介:作为政治媒介化的拓新

媒介、受众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媒介化社会”(media society)。^⑪ 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

① Winfried Schulz,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9, No. 1, 2004.

② 周翔、李稼:《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③ Stig Hjarvard,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Vol. 29, No. 2, 2008.

④ Stig Hjarvard,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Bristol: Intellect Books, 2004, p. 48.

⑤ Frank Esser and Jesper Strömbäck,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236-238.

⑥ Frank Esser, “Mediatization as a Challenge: Media Logic Versus Political Logic,” in Hanspeter Kriesi et al. (eds.),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64-165.

⑦ David L. Altheide and Robert P. Snow, *Media Logi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 10.

⑧ Kent Asp, “News Media Logic in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5, No. 3, 2014.

⑨ Gianpietro Mazzoleni and Winfried Schulz,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6, No. 3, 1999.

⑩ Nino Landerer, “Rethinking the Log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23, No. 3, 2013.

⑪ 张晓锋:《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

视频媒介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延伸，逐渐在现代生活中成为信息传递和社交互动的核心工具。视频媒介在社会的演进也造就了“视频化社会”（video society）的出现，视频媒介与社会生活相融合，使得个体对于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的认知更多地依托于视频媒介生成。^① 具体而言，个体和群体在视频化社会的背景下努力寻求“视频化生存”（video survival），通过视频媒介来表达和诠释自我并参与到社会互动中，通过视频记录和分享个人经验，从文化领域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推动“从个体日常生活延展到社会关系的重组”^②。

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判定视频媒介已经不是简单地渗入政治传播领域，而是与政治紧密黏合在一起而无法分离。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提出，视频媒介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混合的媒体生态系统，极大地改变了政治传播方式和公众的参与方式，^③ 视频媒介已经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改变了人类实践的参照点，成为人们理解日常现实和构建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④ 视频化政治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影响。冯宏良、刘婧认为，视频媒介带来政治内容的视频化表达，“浅思维化”的政治信息传播，可能会带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式微的风险。^⑤ 尤曼斯（Youmans）和约克（York）认为，视频媒介和社交媒体平台为抗议者提供了传播抗议活动和组织集体行动的平台工具，极大地增强了政治动员和信息传播的效果，还影响着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发展。^⑥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政治媒介化逐渐形成较完备的研究体系，但视频媒介对政治媒介化理论带来怎样的新发展仍需探究。本文基于理论梳理和案例分析，探讨视频化政治的概念意涵，阐释视频化政治蕴含的维度和逻辑，并结合全球政治传播实践中的“视频化政治”现象探讨其如何生成、有何表征。

三、何为视频化政治：概念、维度与逻辑

（一）视频化政治的概念内涵

视频化政治的现象伴随着数字设施和视频技术普及而兴起，是政治媒介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视频平台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传播和公共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学界对于“视频化政治”（video politics）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泛指在视频媒介下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政治表达和政治传播活动。^⑦ 以往的研究将视频化政治断定为视频媒介融入政治的单向过程，与政治媒介化一致。其实，视频化政治包含“视频逻辑”和“政治逻辑”。在“视频逻辑”的影响下，政治活动、政治传播和政治参与发生“视频化”的转向，“政治逻辑”的政治、政体、政策越来越依照视频媒介的逻辑而行进；同时，视频媒介也受到政治逻辑的影响偏向政治取向，在文化娱乐的定位下越来越暗含着政治意味。因此，本文基于政治媒介化理论，尝试对“视频化政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视频化政治是指新媒体时代以视频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技术支撑，以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为传播渠道，以视频媒介为传播形式，由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政治传播形态。

① 孟建、符艺娜：《视频化社会：对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阐释》，《新闻爱好者》2024年第3期。

② 孙玮：《技术文化：视频化生存的前世、今生、未来》，《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4期。

③ Andrew Chadwick,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10.

④ Nick Couldry and Andrea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16.

⑤ 冯宏良、刘婧：《政治传播变革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化解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⑥ William Lafi Youmans and Jillian C. York, “Social Media and the Activist Toolkit: User Agreements, Corporate Interests, an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2, No. 2, 2012.

⑦ Yury Kolotaev and Konrad Kollnig, “Political Influence of Online Platforms: YouTube’s Place in Europe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2, 2021.

视频化政治较传统媒体政治传播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信息传播的方式革新。传统的政治传播逐渐向数字化、视频化变革,政治在“视频逻辑”的作用下成为一种遍在的、日常的政治形态,如政党和政府利用 YouTube、Twitter 等平台发布视频和进行直播,对公众进行政治宣传,民众拍摄日常生活视频传播政治诉求等。二是视频化政治体现在对政治参与方式的变革。视频媒介的多样化和实时化模式,突破政治参与的时间空间限制,民众通过观看政治视频,参与讨论、评论和分享政治议题,YouTube、Twitch、TikTok 等社交娱乐平台呈现“玩政治”(playing politics)的特征,成为传播政治信息和参与政治表达的隐性载体。三是视频化政治对政治传播内容的更新。视频化政治突显视频的特征,注重视觉和情感的传达,政治视频改换文字与图片的固定格式,利用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元素更生动地进行政治活动,凭借情感拟态环境的营造,能够有效地进行情感和态度引导。四是视频化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对政治传播、参与、表达的门槛的削减。一方面是视频媒介在技术进化中早已融入各个阶层,视频生产制作门槛在智能终端和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被降到最低,视频媒介带来信息生产传播环节前所未有的简化;另一方面是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延伸,精英阶层对政治传播的统治权威消解,广泛的、基层的公众都被纳入政治传播体系之中,为不同政治参与者提供了平等发声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政治话语权的格局,政治传播呈现下沉态势。

(二) 视频化政治的降维与升维

“视频化政治”中存在着维度的高低变化。^①所谓降维,指的是参与门槛的降低和政治信息的简化。一方面,降维体现在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准入条件。视频技术的普及削弱了精英与民众的区隔,不同的文化水平、政治立场的主体都可以加入政治事件的视频生产传播中。此外,视频媒介实现了“话语降维”,使得政治信息能够隐藏于更深层次,以躲避平台中的屏蔽机制,防止因敏感词句导致封禁。同时,视频媒介不要求“遣词造句”的文字撰写能力,参与者依靠简单的视频拍摄、上传就能够实现政治信息的传达,将政治表达的文化门槛一再降低。另一方面,降维也体现在对政治信息的简化和扁平化表达上。政治事件具有强烈的冲突和矛盾,视频媒介将复杂的政治语言简化为视觉、听觉和情感符号,如推出国家或政党宣传片而将国家、政党形象凝聚为简单符号,以此拓宽政治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影响力。但降维会造成极端观点通过视频媒介传播,公众往往只捕捉到了浅层信息,而没有深入探讨背后的政治理念和历史背景的现象,容易将事件简化为单一的道德黑白观念。因此,过度简化容易导致公众对事件的误解和偏见,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

升维则体现在政治事件的深层意义勾连,也就是透过现象而与本质进行联系。维度的升级与拓展关注政治事件如何在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被解读和解释,帮助民众更全面地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推动政治对话和社会变革。如在政治事件中一些独立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通过视频发布,深入探讨事件的历史渊源和当代意义,展现背景、观点来源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此外,事件中的政治人物也通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对事件的态度,将简单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意涵进行升维,政治人物的言论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导公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选择。同时,视频媒介的运用能力和传播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政党和政府部门能力的一部分,视频的传播能力逐渐与政治传播能力相勾连。面对传统媒体时代所不具有的广泛受众,视频化政治始终需要在降维与升维两个维度中寻求平衡,过于降维则带来政治传播的单薄化,过于升维则导致政治信息的冗杂而带来政治参与度的降低和传播范围的缩减。

(三) 视频化政治的“媒体逻辑”解读

参考舒尔茨对政治媒介化的“新媒体逻辑”的划分,^② 视频化政治的“新媒体逻辑”也可总结

^① 孙玮:《技术文化:视频化生存的前世、今生、未来》,《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4期。

^② Winfried Schulz, “Mediatization and New Media,” in Frank Esser and Jesper Strömback,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66.

为四个方面。一是新媒体平台上个体、组织和媒体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产生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成为事件记录的工具，拓宽民众了解现实的途径，更是政治立场和情感表达的载体。如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的视频记录了无法否认的证据，使得相关事件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黑人人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BLM）和公众对种族平等的深刻讨论。二是现实中的政治事件通过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在网络空间映射形成公共讨论和在线斗争的“赛博”战场。在政治事件中社交媒体平台凝结了线上线下力量，各方行动者建立虚拟群组进行政治活动，视频媒体平台推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再分化和再聚合。三是视频生产者可以自由讨论各种政治议题，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使得许多边缘化议题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而不同群体可以通过视频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在视频平台的作用下，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会发酵为全球性的关注焦点，视频带来情感的全球“共享”，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抗争可能演化成为全球的关注热点。如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事件视频在TikTok等视频平台快速传播，这些平台成为事件发生后公众辩论和政治斗争的主要平台，视频媒介成为趁手的斗争“利器”，一线的视频生产打破了主流媒体的新闻权威。四是公众可以通过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直接向权力机关表达质疑和不满，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力量，迫使相关机构做出让步或改变，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在“#MeToo”等社会运动的抗议活动中，视频平台推动了信息在全球的快速传播，这或许并未直接带来相关机构的让步，但媒体的社会监督力量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从而推动全球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和相关立法的出台。

四、全球政治传播中视频化政治的内容与表征

在全球政治传播中视频媒介发挥核心作用，多媒体手段将政治信息以更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形式传达给全球公众。这种传播方式惯用于国际政治、外交、战争、国家形象塑造等领域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身体政治、话语政治、情感政治和空间政治四个方面。通过视频媒介，各国政府、政党、民众通过身体展现、话语诉说、情感灌入和空间转移，使得政治信息更加生动和更具感染力地传播，以此增强政治传播的效果，深化全球公众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和反应。

（一）视频化身体政治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政治生命中的基本结构，身体为政治权威和社会共识提供了一种逻辑，也为处于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危机、饥饿和异化时代的终极追求提供了一种身体语言和政治文本。^① 身体政治通过视频媒介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身体器官成为信息传达的新形态，身体的姿态和动作传达着立场和情感，身体承载着政治规范和政治外化，身体的展示和控制是对权力结构的一种挑战，个体和群体通过身体政治在公共空间中重新定义和表达自己的身份和立场。^② 同时，身体也在适应视频化时代的规则，夸张的身体语言和细微的动作被刻意展现在视频之中成为政治符号的一部分，身体的行为动作、身体的形象塑造迎合视频媒介规则是政治传播的新媒体时代的适应演化。

一方面，身体政治体现在身体形象塑造。在视频化时代，身体形象的展现是信息传达的重要形式，主要表现为政治人物的身体形象塑造。在政治传播中，政治人物的身体表现常常通过视频和媒体被放大，以传达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人物的外表、身体语言、举止和姿态，不仅是个人魅力的展示，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以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例，他常被塑造成一个强硬、坚毅的领导者，通过他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如柔道、骑马、打猎等）的身体展示，不畏艰险、精力充沛的国家领袖形象得

^①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②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90.

以塑造，以此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意图，在领导人的身体形象下国家内在的力量与权威得以展示。此外，政治人物的身体健康形象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权力结构产生深远影响，领导人身体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权力延续和治理能力，当国家领导人出现健康问题或意外时，可能导致权力真空，从而引发国内外的政治动荡。例如，拜登任美国总统时身体状态不佳的视频内容被各国民众关注转发，从而引发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工作能力和国家稳定的质疑。因此，许多国家会尽量保持对领导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展示以维持信息的透明性，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政治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身体政治体现在身体行为动作。在政治事件中，身体接触、姿态和距离都在传递着微妙的政治信息，如外交礼仪中的身体表现、身体力量的展现等。政治人物之间的握手常常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它象征着国家关系的变化或稳定。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历史性握手，便被解读为美朝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折的象征，简单的身体接触能够在不言自明的情况下传递出政治和外交上的复杂信号。身体的姿态和空间距离也透露出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政治人物站位的高低、身体的倾向、眼神的交流等，都能传递出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视频媒介中这些细节被捕捉和放大，成为公众解读国家关系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这些身体语言的分析，外界可以推测出国家之间的互动与权力格局。此外，政治人物的身体动作也与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他们通过展示亲民的身体语言，如微笑、握手和轻松的仪态，来拉近与公众的距离。身体符号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通过身体文化的输出可以塑造和传播独特的文化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视频化话语政治

话语政治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话语政治可以概括为“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在话语合理化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媒介，以旨在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和对传统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占有为目的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程序”^①。视频化的话语政治是指通过语言、符号和叙事结构来构建和传播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权力关系，在全球政治传播中，话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权力操作和文化建构的手段。

1. 外交辞令与政治演讲

政治人物在国际场合（如联合国大会、G20峰会等）精心设计的演讲，能够向国内外传达政策立场、政治目标和价值观念。他们通常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精心选择语言和叙事结构，向全球观众传递其国家的政策和立场。例如，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是对国内政策的总结，也是一种向全球传达美国的国际战略的方式。拜登在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演讲中，使用了“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的叙事框架，妄图塑造美俄关系的全球话语，将美国定位为民主的捍卫者，而将俄罗斯描绘为专制的代表。近年来，各个国家的外交部在社交媒体设立账号，如中国在Twitter、YouTube等都设有“Spokesperson发言人办公室”的账号，对外发布“答记者问”等重要视频内容，外交辞令中常常包含隐性权力，通过语言表达方式来施加压力或传达友好。

2. 宣传视频与文化符号

制作和传播国家与政党宣传视频成为新媒体时代塑造国际形象和传播国际理念的重要方式，宣传视频采用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借由视频媒介向全球公众展示，通过正面形象的塑造来增强国家、政党的全球形象认同。2023年中国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形象宣传片 *Belt and Road*，通过展示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构建了中国作为全球发展推动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通过视频中的故事叙述、视觉符号和情感表达，塑造了全球观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当然，话语政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文化符号而作为文化输出的工具，例如韩国通过K-pop音乐视频、韩剧和电影输出其文化，同时向全球传递韩国现代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的形象，文化产品背后暗含的话语在不断地传播韩国的政治信息，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公众对韩

^① 刘建成：《“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

国的正面认知，间接影响了其国际政治形象，也通过“文化腐蚀”影响了邻国公众的政治认知。

3. 媒体变革与话语操控

媒体在话语政治信息流动和话语塑造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家和政党通过控制或影响媒体，来操控公共话语的内容和方向，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公众关注特定的政治议题，进而影响舆论走势，或通过控制全球新闻话语发布来塑造国家、政党的国际形象。如俄罗斯的 RT 电视台和 Sputnik 新闻机构通过传播与西方主流媒体不同的叙事，试图影响国际舆论，特别是在叙利亚冲突、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这些媒体通过提供与西方主流话语相对立的视角，与西方媒体形成舆论混战，以此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增强俄罗斯的国际话语权。

但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了话语政治的新维度，尤其是视频平台的普及化将话语表达的门槛降低，为平民草根话语提供了表达的平台，打破了官方话语垄断政治传播的格局。但主流媒体也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在话语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人甚至通过制造假新闻、使用“僵尸”账号和社交机器人等方式来操控话语。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被用来影响选民的认知和投票，在虚拟空间中影响现实政治，普通民众被裹挟在复杂隐秘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中无法自存。

（三）视频化情感政治

情感是政治动员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情感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和创造世界的方式，^① 情感政治在视频媒介中的运用已然成为当代政治传播中的重要策略。通过抒情和共情的建立，政治行为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公众情感，从而塑造政治舆论、引导公众态度，并在更深层次上增强对特定政治议题或行动的支持。

1. 抒情：政治议题引导和形象塑造

情感政治中的抒情，指的是通过视频中的情感表达来塑造和传播特定的政治议题和政治形象。抒情作为引导公众情感的策略，使得情感政治成为一种软性政治传播手段，情感化（愤怒、恐惧）的视频内容通常被用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反应，从而强化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和支持。在危机事件中，政府或媒体通过情感化的视频内容塑造国家的紧迫感，以动员公众支持其政策措施。如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情感化的宣传视频展示战争中的平民困境、儿童的无辜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激发观众的同情心和爱国情感，促使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乌克兰局势。情感政治还通过展示悲剧性事件来推动特定的政策议程。如美国在枪支暴力问题下展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经历，将复杂的政策问题转化为易于理解和引发情感共鸣的议题，其目的是通过观众的情感共鸣来推动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出台，从而在公众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全球政治传播中，情感表达通过情感共鸣强化公众的支持，增强与公众的情感联系，进而塑造公众形象。情感表达建立的形象往往能够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未来的政治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时任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后发表的视频演讲中，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悲伤，通过情感表达，阿德恩成功地塑造了她作为一个关怀民众的领导人的形象，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外对其领导能力的认同。同时，情感化的演讲或视频也能增强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通过情感化的演讲视频来安抚民众、呼吁合作，增强公众对防疫政策的支持，通过表达对受疫情影响的家庭和社区的关怀，领导人得以在人们最为脆弱的时刻建立起情感联系，从而强化其政策的执行力和合法性。

2. 共情：建立政治认同和跨国动员

共情是通过传播引导公众进入特定的情感状态，从而建立对政治议题的认同，这不仅包含对他人情感的理解，更是对他人处境的认同和支持。视频媒介带来共情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情感共享”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共情反应，产生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情绪共情（affective empathy）和行

^①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

为共情 (behavioural empathy) 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个人经历的情感表达唤起广泛的社会共鸣, 形成“情感共同体”,^① 从而推动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

政治行为体通过故事叙述来引发观众的共情, 展示具体人物的生活困境, 如讲述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园的家庭或因极端天气而陷入贫困的农民的故事, 唤起观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情。通过这些共情的故事叙述, 观众了解了气候变化的危害, 产生支持相关环保政策的动机。共情也是社会运动中动员支持的关键策略, 通过共情的建立, 原本可能被忽视或低估的议题得以在公共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策响应。在全球化背景下, 视频媒介的共情具有跨国界的特点, 通过个体故事、情感化的画面和悲剧性事件的视频叙述, 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建立起跨国的情感连接, 增强观众对他国民众的同情心, 通过共情建立的情感连接能够发挥国际政治传播中的强大动员作用, 促使公众参与到行动中。2015 年叙利亚小男孩艾伦·库尔德在海滩上遇难的照片和相关视频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引发了公众对难民问题的巨大关注和同情, 跨国界的共情反应推动了部分国家对难民接纳政策的改变,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

(四) 视频化空间政治

空间政治在视频媒介中表现为权力如何通过空间的控制、分配和再现来达成政治目标。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强调, “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存在, 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空间被权力关系和社会实践所生产和再生产”, 并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和表征性的空间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三重,^② 视频媒介中的空间也不仅仅是背景或场景, 而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载体。

1. 空间的象征性再现与政治权力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 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 还包括了象征性和社会性的维度。在视频媒介中, 空间的象征性再现用于展示和巩固政治权力, 政治行为体能够将特定空间赋予象征意义, 传达政治信息。例如, 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视频, 利用了象征性空间来传递国家权威和总统的合法性, 这种空间不仅是权力的物理中心, 更通过视频的呈现成为全球观众认知中的权力象征, 象征性空间的再现使得空间成为政治权力的具象化载体, 强化了国家权力的视觉呈现。同时, 在政治事件中存在公共空间的政治性占领, 在一些政治抗议或运动中, 抗议者占领了多个公共场所, 如政府大楼和主要街道, 公共空间的占领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控制, 更象征着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对公共话语权的争夺。而在视频媒体中虚拟空间的意义占领已然成为政治抗议不可或缺的部分, 视频的记录与传播实现了网络空间的“赛博”政治性占领, 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形成联结, 线上线下的象征性空间的建构和再现压缩了官方政治的存在空间。

2. 空间的控制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列斐伏尔强调, 空间的生产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 空间的控制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密不可分, 空间的控制往往被用来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或挑战现有权力结构。政府在应对社会动荡时, 常通过展示空间的控制, 以传递恢复秩序的信息。在法国黄背心运动中, 政府通过视频发布展示警察在巴黎街头的部署和控制, 意图传递出恢复社会秩序的信息。通过空间的秩序化展示, 政府试图在公众和国际社会中塑造一种稳定和可控的形象, 借此维护政治合法性。列斐伏尔的理论在此解释了空间如何通过权力的运作被生产为一种秩序化的象征, 并通过视频传播被公众所接受。另一种空间控制的表现形式是通过隔离和限制来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例如, 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对城市和社区的封锁措施, 这种空间的隔离不仅是物理上的控制, 也是社会秩序维持的一部分。通过视频中的空间展示, 观众不仅看到了物理空间的变化, 更感受到了一种由政府主导的控制感和安全感。这种官方的安全控制通过社

^① 赵建国:《论共情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33.

交媒体视频得以广泛传播和认同。

3. 空间的叙事性构建与历史记忆的争夺

列斐伏尔还认为空间是历史记忆和社会关系的叙事性载体。视频能够对特定空间进行叙事性构建，常常被用于重新定义或争夺历史记忆。2023 年俄罗斯在纪念二战胜利的视频中，利用了莫斯科红场这一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空间，通过展示军队阅兵和向老兵致敬，强化了俄罗斯作为“卫国战争”胜利者的历史记忆。视频空间的叙事性构建再现了特定的历史事件，通过空间的象征性使用巩固了国家的历史叙事和政治合法性。同时，视频空间也常被用作争夺历史记忆的战场。在 2020 年美国黑人被暴力执法致死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抗议者拍摄传播场景还原视频将此时场景与“黑奴压迫”相关联，在多个城市涂鸦并占领历史悠久的纪念碑广场，试图通过身体行为和记忆勾连的再定义来挑战既有的历史记忆，通过建立新叙事来重新赋予空间以政治意义。相关视频的广泛传播促成了空间再定义，视频媒介空间成为历史记忆争夺中的重要元素，视频内容的再建构影响了公众对历史的认知。

4. 空间的虚拟化与全球传播

列斐伏尔在理论中未直接讨论网络虚拟空间，但他的理论可以延伸至理解社交媒体中的虚拟空间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视频被生产出来，又如何在全球政治传播中发挥作用。在视频媒介中，虚拟空间的生产和传播不仅是现实空间的再现，还有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通过视频平台，政治行为体可以跨越地理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例如，2021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期间，双方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展示不同的空间视角，以争夺国际舆论的支持。以色列展示其城市遭受火箭弹袭击后的场景，而巴勒斯坦则展示加沙地区的破坏和居民的困境。这些视频通过虚拟空间的传播，超越了地域限制，使全球观众能够“进入”这些冲突空间中，从而形成对冲突的情感共鸣或政治立场。此外，虚拟空间成为政治动员的关键场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拟抗议和动员活动，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将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个体集结在一起，形成了虚拟的抗议空间。虚拟空间的视觉和情感的共鸣生产，增强了政治动员的效果，扩展了传统政治空间的边界。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智媒技术的发展，视频化政治已经发展成为现代政治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催发政治传播方式的变革，在视频媒介的作用下传播方式从传统的文字和图片向视频转变，这种转变受益于受众的媒介习惯，也基于媒介技术和平台媒体的发展。

（一）视频化政治出现并在持续演化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视频媒介基于其自身带有的强烈的信息属性和对视觉、听觉等多模态增强感官刺激的集成，能够更有效地引起受众的注意，并增强受众的记忆和理解，这是文本传播所难以企及的。视频化政治为政治领域带来的最大变革在于政治传播的下沉，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依靠视频媒介参政议政，参与到政治话语的建构中去，这种去中心化的政治传播方式，一改以往政治传播的精英意味，扩大了民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在全球政治传播中，视频化政治的演化极为迅速，这是由于传统媒体的集结效用有限，而在社交媒体的支持下，组织的集结和信息的流通进程被加速，情感的力量被注入其中，各方行动者通过视频的生产博弈形成复杂的互动网络，视频媒介凝结线上线下各方主体的参与。在视频化政治中，Facebook、YouTube、TikTok 等平台为政治视频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成为信息的传播通道，也成为信息的过滤器和放大器。政治家、媒体机构、社会运动组织和民众等不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主动传播者，通过评论、分享等方式，进一步扩散和放大政治信息，影响公众舆论。如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团队广泛利用社交媒体视频进行政治宣传，通过制作简短、直观、有

冲击力的视频，成功吸引了大量选民的注意力，极大影响了选举结果。

（二）视频化政治的现实价值

视频化政治在现代传播环境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优势。视频技术已经深入社会基层，覆盖全球广泛的受众，尤其在突发事件和重大政治事件中，视频传播的碎片化、快速化优势尤为明显。在国际舆论中，众多视频通过图像和声音的编辑、剪辑技术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增强政治信息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也使得虚假信息、断章取义的内容更容易传播，增加了信息辨别的难度，碎片化和情绪化特征可能加剧舆论的极化，影响理性讨论和公共决策。

当然，视频化政治在国际传播中同样具备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从国家形象塑造来说，制作高质量的政治视频，展示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我国近年来制作并全球发布的一系列展示中国风貌的视频，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同时，视频形成了一种遍在的、日常的政治传播渠道，视频化政治暗含政治意味但以文化为掩盖，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更加直观地向国际受众传递政治信息，所以借用视频媒介进行文化推广，或能为国际传播提供正向力量。此外，在近年的国际政治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出，视频化传播逐渐成为及时发布官方声明和澄清信息，引导国际舆论甚至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博弈更多体现在舆论斗争场域中的交锋，国际舆论把控能力越来越成为国际实力的重要表征，这也决定了视频媒介必然成为国际舆论斗争中的影像武器。在全球化与媒介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视频化政治已然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性、可行性实践路径。近年来通过短视频、纪录片、直播等可视化载体，中国得以寻求“文字中心主义”的传播壁垒突破口，以具象化叙事重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如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宣传片展现的大党担当，脱贫攻坚纪录片呈现的中国发展图景，中国外交一线直播传递的政策立场，在情感共鸣中实现政治符号的跨文化转译。视频化政治将促成国际传播从“解释中国”转向“体验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具身化传播的新维度。总而言之，视频化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既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公众参与的扩大上，也体现在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在未来，如何充分利用视频化政治的优势，同时应对其带来的挑战，使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土目标，将是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衍生课题。

（责任编辑：赵荣华）